

国家社科基金资助期刊 · 教育部高校学报名刊 · 国家期刊奖百种重点期刊 · CSSCI来源期刊

中国人文社会科学A刊权威期刊 · 北京大学中文核心期刊 · 美国LLBA收录期刊

外语教学与研究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外国语文双月刊

Vol. 56 No. 4

2024 / 4

《外语教学与研究》第56卷第4期

(2024年7月)

目 录

· 语言学 ·

- 英语同位语从句结构的递归模式 丁彧藻 万正辉 王丽萍 (483)
- 局部语法路径下的短语项拓展研究
——以《美国国情咨文》中 the X is that/to 为例 刘运锋 (496)
- 分布式形态学框架下汉语强弱动结式的比较研究 杨大然 施燕铃 (507)
- 融媒框架下多模态词典及其释义的理论模式研究 章宜华 (519)

· 语言对比研究 ·

- 世界主要语系的语言内部差异
——基于 ASJP 距离计算的考察 冉启斌 王乙婷 (532)
- 跨语言视角下视觉动词的行为特征研究 戴 颖 吴义诚 (544)

· 外语教育 · (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学报名栏)

- 中国英语二语学习者词汇识别中的形音依赖
..... 于 秒 马雪梅 戴若林 (556)
- 二语语境下母语语音信息的预激活
——基于眼动视觉情境范式的研究 徐晓东 朱宏丽 (569)
- 汉英孤独症儿童心理状态词产出的语料库对比研究 蒋宇涵 王 婷 (581)
- 中国日语学习者在母语词汇识别过程中的二语激活 杨思琴 江铭虎 (594)

· 外语学科建设 ·

- 我国中外语言文学学科内涵及范围比较 常俊跃 (607)
- 区域国别学视域下外语人才培养的模型构建与优化路径
..... 沈 骑 顾钧仪 (618)

· 书刊评介 ·

- 《互动成分语法》介评 黄 丹 (628)
- 《伪名词融合与受词异相标记》评介 刘星宇 (633)
- 会 讯 (617)
- 英文摘要 (638)

编辑部主任：郭 洁

本期执行编辑：郭 洁

[期刊基本参数] CN11—1251/G4 * 1957 * b * 16 * 160 * zh—en * P * ¥32.00 * 9000 * 14 * 2024—07

DOI:10.19923/j.cnki.fltr.2024.04.004

分布式形态学框架下汉语强弱动结式的 比较研究*

杭州师范大学 杨大然 施燕铃

提要:本文以 Washio (1997) 提出的结果结构二分法为背景, 深入探讨汉语强弱动结式的区分及生成机制问题。本文通过三个鉴别手段从句法表现的差异上对两类动结式进行区分, 从句法-语义的接口角度证明了汉语动结式确实存在强弱之分。在此基础上, 本文采用分布式形态学框架探讨两类动结式的句法生成机制, 将强弱动结式的不同句法表现归结为带有省略句法特征的词根在定类组合方式上的差异: 强动结式的词根是先定类后组合, 而弱动结式的词根是先组合后定类, 两类词根在句法推导中分别呈现出的“分离态”和“黏合态”既反映了两者的语义蕴含关系, 也直接决定了两类动结式在句法表现上的一系列差异。

关键词:强动结式、弱动结式、分布式形态学、融合、并入

[中图分类号] H04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0429 (2024) 04-0507-12

1. 引言

结果结构 (resultative construction) 是语言中表达致使关系的常用句式, 它通过主动词 (V) 和结果补语 (R) 组成复杂谓词来表达达成类或完结类复合事件, 如例 (1) 所示。

(1) a. Mary cried her handkerchief soggy. b. Bill painted the wall blue.

Washio (1997) 通过比较发现, 日语中只存在与 (1b) 对应的结果结构, 而与 (1a) 对应的句子不合法。为了解释这一差异, Washio 根据 V 和 R 的语义

* 本文系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生物语言学视域下汉语宏事件编码的形态句法研究”(20BY163)的阶段性成果。衷心感谢《外语教学与研究》编辑部及匿名审稿专家提出的宝贵修改意见。

蕴含关系对结果结构进行了二分: V 在语义上不蕴含 R 的为强结果结构 (strong resultatives) (如 1a), V 在语义上蕴含 R 的为弱结果结构 (weak resultatives) (如 1b)。依据这一标准, 自然语言可从总体上分为两类: 一类既允许强结果结构, 也允许弱结果结构 (如英语); 另一类则只允许弱结果结构 (如日语)。

近年来, 一些学者关注到汉语结果结构的强弱之分, 其基本看法是汉语与英语一样, 也具有强弱两种结果结构, 判定的主要依据是与英语强弱结果结构相对应的汉语动结式 (resultative verb compound)¹ 都合法。然而, 汉语动结式的“动”(V) 与“结”(R) 组合十分灵活, 能产性高, 内部的词汇意义和凝固程度存在很大差别, 很多动结式在英语中找不到其对应表达, 仅依赖 V 与 R 的语义关系无法进行有效判定。鉴于此, 本文将在分布式形态学 (Distributed Morphology, 简称 DM) 理论框架下着重探讨以下问题: 1) 除语义关系的判定外, 还有哪些句法鉴别手段能有效区分汉语强弱动结式? 2) 这两类动结式在生成机制上存在哪些差异? 3) 这些差异与两类结构在句法表现上的分立有何关联? 对上述问题的探讨既有助于进一步挖掘动结式自身的形态句法特征, 也能为类型学视野下结果结构的跨语言研究提供新的视角。

2. 结果结构二分法及其问题

Washio (1997) 提出的结果结构二分法是基于 Levin & Rappaport Hovav (1995) 的谓词分解模式。依据该模式, 强结果结构中 R 的词汇语义可以独立于 V, 其特点是“无法从主要谓词的词汇语义预测受事所形成的结果状态” (Washio 1997: 10)。如例 (2) 所示, 次要谓词 *sore* 和 *hoarse* 表达的结果都未蕴含于主动词的语义之中, V 与 R 的词汇语义彼此独立。

- (2) a. The boy danced his feet *sore*. b. He sang his throat *hoarse*.

与此相对, 弱结果结构中 V 与 R 的语义存在蕴含关系, 即 V 的义素中包含某种结果倾向, R 指称的状态蕴含于这一结果倾向中, 或对该结果作进一步说明。如例 (3) 所示, *clean* 和 *pointy* 分别蕴含于各自主动词的语义之中, 表达后者的预期结果。(1b) 也类似, 其中 *paint* 的语义虽然不蕴含某种具体颜色, 但 *blue* 可视为对墙壁色彩变化的具体说明, 是 *paint* 动作的可预期结果。

- (3) a. He wiped the table *clean*. b. He sharpened the pencil *pointy*.

将动结式分为强弱二式可以较好地刻画不同语言在结果事件编码方式上的

¹ 汉语动结式还不完全等同于结果结构, 可看作是结果结构的一种类型。为避免误解, 本文指称汉语相关结构时用“动结式”, 指称其他语言时用“结果结构”。

3. 强弱动结式的句法鉴别手段

3.1 鉴别手段一:能否允准“伪宾语”

Wechsler (2005) 根据 V 与其后宾语的题元关系区分了控制类 (control) 和例外赋格类 (exceptional case-marking, 简称 ECM) 结果结构。(3a) 代表控制类, 动词 wipe 既向宾语 the table 指派受事题元, 也为其赋宾格。(6a) 代表 ECM 类, 其中 the pavement 被称为“伪宾语” (fake object) (Simpson 1983), 它不是非作格动词 run 的论元, 而是由整个结果结构所允准。run 只负责为 pavement 赋格, 但不向其指派题元角色, 属于 ECM 的情况, 删除次谓语 thin 会导致结构不合法 (如 6b)。

- (6) a. The joggers ran the pavement thin. b. * The joggers ran the pavement.

从例 (4) 和例 (5) 的对比来看, 两组例句分别对应英语的 ECM 类和控制类结果结构。例 (5) 中的宾语都是 V 的直接作用对象, 与 V 存在题元关系, 应归为控制类结果结构。而例 (4a) 中的“跳”为不及物动词, 与宾语无论元选择关系, 即“跳双腿”不合法; (4b) 中的“唱”虽为及物动词, 但真正的受事成分 (如“军歌”) 被省略, “嗓子”也属于“伪宾语”。

鉴于上述差别, 我们主张将能否允准“伪宾语”作为强弱动结式的鉴别手段之一, 能允准伪宾语的为强动结式, 不能允准伪宾语的为弱动结式。该鉴别式有两点证据支持。其一, Wechsler (2005) 等观察到, 对于 (7a) 的弱结果结构, 当把 R 替换为反预期的结果补语时, 其可接受度会大打折扣, 如 (7b)。而 Neeleman & van de Koot (2002) 指出, (7b) 在特定语境下完全可以成立, 如约翰在擦地板时不小心弄脏了桌子, 该语境下“桌子”并非“擦”的直接宾语, 此时该句应为 ECM 类结果结构。这说明当 V 为及物动词时, 若 R 表达的是反预期结果, 其成立条件往往是将其宾语解读为与 V 无题元关系的伪宾语。因此, 通过能否允准伪宾语来判定动结式的强弱性质具有合理性。

- (7) a. John wiped the table clean. b. ? John wiped the table dirty.

其二, 该鉴别手段也得到跨语言事实的支持。Washio (1997: 27) 和 Li (2014: 19) 发现, 只允许弱结果结构的语言都不允许带“伪宾语”的 ECM 类结果结构, 如例 (8a—b) 的法语和罗马尼亚语, 以及日语、朝鲜语都只允许弱结果结构, 而这些语言中的 ECM 类结果结构都不合法。

- (8) a. * Il a marché les jambes raides. b. * Ion a alergat trotuarul subtire.
he has walked the legs stiff Ion has run sidewalk thin
'He walked his legs off (lit. stiff).' 'Ion ran the pavement thin.'

3.2 鉴别手段二:能否转换为带“都”的结果性“得”字句

汉语中与动结式关系密切的一类结构是结果性“得”字句,其基本形式为“S+V得+(DP)+XP”。目前学界的主流观点(如Huang 2006; Zhang 2007等)认为,结果性“得”字句与相应的动结式具有相同的底层结构,两者因推导方式不同而形成不同的表层形式。然而两者的转换并非任意,而是存在两方面的限制条件。一是结果补语在语义上的差异(见程工、池杨琴 2017: 516)。如(9a)所示,动结式的R“晕”是按习语性解读,而“得”字句的补语“晕”则是按字面义解读,导致句子语义出现问题。二是结果补语的结构大小不同(见程工、杨大然 2016)。如(9b)所示,动结式的R结构小,一般为单语素的动词或形容词;而“得”字句的结果成分是结构大的复杂形式,一般不能是单语素的简单形式。

(9) a. 听到这样的理由,大家都笑晕了。/* 大家笑得都晕了。

b. 张三打伤了李四。/* 张三打得李四伤了。/ 张三打得李四伤痕累累。

我们观察发现,例(4)和例(5)在“得”字句的转换上存在明显差异,且无法用上述两个条件进行解释。如例(10)和例(11)所示,两组动结式的R都是按字面义来诠释,不存在习语义与字面义的差别;此外,“得”后都是由小结构的简单形容词做补语,可见其合法性的差别与结果补语的结构大小无关²。

(10) a. 学生们跳舞跳得脚都酸了。

b. 张三唱得嗓子都哑了。

(11) a. * 他擦得桌子都干净了。

b. * 他削得(那根)铅笔都尖了。

本文认为,例(10)与例(11)的合法性差异跟动结式中V与R间的语义蕴含关系直接相关:当V与R的语义不存在蕴含关系,即R表达V的非预期结果时,动结式可以转换为相应的“得”字句,且一般加入“都”来强调结果的偏离性。“得”字句补语中的“都”作为焦点副词,表达反预期的语义功能,在语义上强调R的结果超出V可能造成的影响程度(同上)。相反,当R表达V的预期结果时,会与“都”的反预期功能相悖,因而例(11)中的各句不能成立。

据此,我们将带“都”的结果性“得”字句作为区分强弱动结式的第二个句法手段,能转换为该句式的为强动结式,反之则为弱动结式。据此,当把例(11)中的R换成表达V非预期结果的成分,使其“变身”为强动结式,再转换为带“都”的“得”字句后接受度会大幅提高。这一点恰恰与事实相符,如例(12)所

2 审稿专家指出,某些弱动结式也有相应的“得”字句,如“张三擦干净了桌子/张三把桌子擦得很干净”,但此处的“得”字句与本文讨论的带“都”的“得”字句不同。前者是表达常规的结果状态,动结式与其转换受结构大小的限制,即结果补语前需加程度副词“很”“非常”,或采用重叠式(如“擦得干干净净”);后者是反预期型的结果性“得”字句,动结式与其转换不受结构大小的限制,而是取决于V与R的语义蕴含关系。感谢审稿专家的意见!

示,这进一步说明了该句法鉴别手段的合理性。

- (12) a. 他擦脏了桌子。→ 他擦得桌子都脏了。
b. 他削断了好几支铅笔。→ 他削得好几支铅笔都断了。

3.3 鉴别手段三:能否构成倒置动结式

在常规结果结构中,主语既是V的施事也是致使关系的致事,但汉语还有一类较特殊的动结式,其中的主语(NP₁)是V的受事,而宾语(NP₂)的中心语或修饰语是V的施事,被称为“倒置动结式”(熊学亮、魏薇 2014),如例(13)。

- (13) a. 精湛演技看哭了琼瑶。 b. 那本书写白了张三的头发。

前人对倒置动结式的生成做过大量研究,大都认同其论元实现是由动结式整体的致使关系所决定,与V自身的题元关系无关,主语和宾语在致使事件中分别担任致事和役事(Li 1999;熊仲儒 2004)。通过对比发现,例(4)和例(5)两组动结式在能否构成倒置动结式上也存在显著差异。例(4)可以构成相应的倒置结构,如例(14);相反,对于例(5),当V的受事占据主语位置后,宾语位置不可再出现V的施事,否则句子不合语法,如例(15)。

- (14) a. 那支舞蹈跳酸了她的双腿。 b. 那首歌唱哑了张三的嗓子。
(15) a. 桌子擦干净了(*张三)。 b. 那支铅笔削尖了(*李四)。

熊学亮、魏薇(2014)指出,上述差异与R的语义指向有关,倒置动结式的构式义中包含[NP₂ R]的结果事件,这要求R必须指向NP₂,而例(15)中的R均不能指向括号中的NP₂,导致句子不合法。本文认为这一解释并未触及问题的本质,上述差异看似是R的语义指向差别,实则跟V与R的语义关系密切相关。对于例(15),由于R的语义蕴含于V之中,当V的受事(如“桌子”)做主语时,R(如“干净”)必然指向该主语,指称其在V作用下形成的结果状态,这样就阻碍了R指向NP₂的可能性。相反,对于例(14),由于R的语义完全独立于V,因此两者可分别指向NP₂和NP₁,形成具有因果关系的两个独立子事件。

按照上述分析,只有动结式V和R的语义相互独立时,才有可能构成倒置动结式。据此,我们将能否构成倒置动结式作为强弱动结式的第三个判别手段。依据该鉴别式,若将例(15)中的R替换为表达V非预期结果的成分,动结式应该可以构成倒置动结式。这一点也确与事实相符,如例(16),这进一步说明了该句法鉴别手段的合理性。

- (16) a. 那堆脏衣服洗累了张三。 b. 那几支铅笔削烦了李四。

4. 基于分布式形态学的生成分析

分布式形态学的核心理念是“单引擎假说”(Single Engine Hypothesis),认为构词和构句采用相同的生成机制,不存在独立于句法规则之外的词库派生规则。根据“(词根)定类假说”(Categorization Assumption)(Embick & Noyer 2007: 294),句子推导的初始项不是传统意义上的词,而是不含语类特征的裸词根,它们必须与某个定类语素合并后方可参与句法运算。

不少学者采纳DM的这种“句法构词”思想来分析动结式的生成(如程工、杨大然 2016;周光磊 2019;蔡军 2021;杨大然 2021等),形成的共识是动结式的V和R以裸词根形式(即 \sqrt{V} 和 \sqrt{R})进入推导,在句法中与功能语素合并获得定类。句法构建主要涉及两层功能投射:下层是表达结果性子事件的功能投射 $v_{\text{Bec(ome)}}$ P(熊仲儒 2004;程工、杨大然 2016等);上层是表达致使性子事件的功能投射 v_{Cause} P(杨大然 2021)。目前学界对 \sqrt{V} 和 \sqrt{R} 的句法定类方式尚存在分歧。一种看法是词根先定类后组合,即 \sqrt{V} 和 \sqrt{R} 分别由不同的功能语素定类,而后合并为动结式复合词(程工、杨大然 2016;周光磊 2019)。另一种看法是词根先组合后定类,即 \sqrt{V} 和 \sqrt{R} 作为裸词根先合并为复合词根 \sqrt{VR} ,而后与功能语素合并获得相应的句法属性(Huang, Li & Li 2009;蔡军 2021)。

杨炎华(2021)针对汉语复合词特点提出了一个折中方案,即假设词根在初始合并时既不是毫无句法特征,也不具备完整的句法特征,而是带有缺陷(deficient)的句法特征。按照这一方案, \sqrt{V} [y]作为中心语与 \sqrt{R} [z]先合并为[y]P([y]和[z]代表缺陷特征),而后与定类语素 v 合并,最终投射为 v P(同上:165),如(17)所示。该方案既确保了功能语素 v 在句法定类上的核心作用,也保证了两个词根可以按句法规则合并且具有较高的语义透明度。

$$(17) [{}_v P [{}_y P \sqrt{V} [y] \sqrt{R} [z]] v]$$

本文认同为词根赋缺陷特征的方案,但需进一步思考的是,若所有动结式具有统一派生模式,那么如何解释强弱动结式在句法表现上的差异?在此我们采纳Mateu(2012)的形态句法分析方法以寻求合理解释。Mateu提出,弱结果结构的生成主要涉及词根与功能语素的并入(incorporation)操作。Haugen(2009: 260)认为其本质是一种中心语移位(head-movement);而强结果结构的生成既涉及状态类词根与功能语素的并入,也涉及活动类词根与致使轻动词 v 的融合(conflation),是一种直接性的外合并(direct Merge),即词根作为修饰语直接嫁接于功能中心语,不涉及句法成分的移位(同上:253)。

Mateu(2012)认为融合和并入是词汇句法(L-syntax)内的构词手段,而从

本质上讲, L-syntax 与 DM 的“句法构词”理念有相通之处,两者都将词根作为推导的初始项,通过与功能语类的结合构建完整词项,而区别在于 DM 认为词汇句法中的形态操作应交由句法完成。本文虽否认 L-syntax 模块的存在,但主张采纳 Mateu (同上)提出的并入和融合两种操作机制。杨炎华(2021)对词根性质的看法也支持将并入和融合运用于句法操作中,他认为词根与功能语素可能形成两种结构关系:一是补足语与中心语,二是附加语与中心语,这两种情况恰好对应于实施并入和融合所要求的结构关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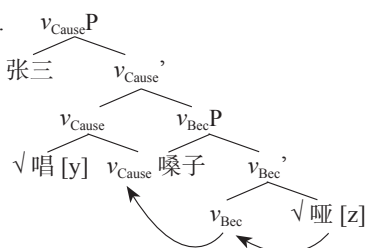
综上,本文对汉语强弱动结式的生成提出如下假设:1)动结式的 V 和 R 进入推导时是带省略句法特征的词根,分别记作 $\sqrt{V} [y]$ 和 $\sqrt{R} [z]$; 2)弱动结式的 $\sqrt{V} [y]$ 和 $\sqrt{R} [z]$ 首先合并,形成一个复合词根,而后并入功能语素获得定类; 3)强动结式的 $\sqrt{V} [y]$ 和 $\sqrt{R} [z]$ 在语义上彼此独立,不存在率先合并的可能,两者分别通过融合和并入与功能语素合并获得定类,而后合并为复合词项。

根据以上假设,例(18a—b)两类动结式各自的生成过程如(19a—b)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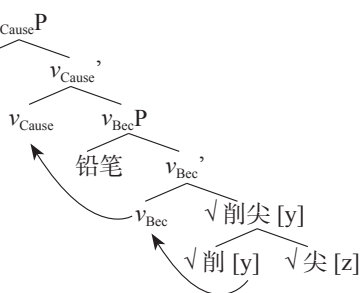
(18) a. 张三唱哑了嗓子。

b. 李四削尖了铅笔。

(19) a.



b.



对于(18a)的强动结式,结果类词根“ $\sqrt{\text{哑}} [z]$ ”基础生成于 v_{Bec} 的补足语位置,在推导中并入后者,而活动类词根“ $\sqrt{\text{唱}} [y]$ ”通过融合方式直接合并于上层轻动词 v_{Cause} ,获得句法定类。在推导中,下层中心语“ $\sqrt{\text{哑}} -v_{\text{Bec}}$ ”移位至上层中心语“ $\sqrt{\text{唱}} -v_{\text{Cause}}$ ”,形成动结式复合形式³,如(19a)所示。对于(18b)的弱动结式,带有省略特征的“ $\sqrt{\text{削}} [y]$ ”和“ $\sqrt{\text{尖}} [z]$ ”先发生合并,形成复合词根“ $\sqrt{\text{削尖}} [y]$ ”,而后并入到上层功能语类 v_{Bec} 获得句法定类,形成复合中心语“ $\sqrt{\text{削尖}} [y] -v_{\text{Bec}}$ ”,内论元“铅笔”合并于 $[\text{Spec}, v_{\text{Bec}}P]$ 。而后,该结构进一步与致使轻动词 v_{Cause} 合并,外论元“李四”在 $[\text{Spec}, v_{\text{Cause}}P]$ 引入,形成完整的致使性句法结构,复合中心语“ $\sqrt{\text{削尖}} -v_{\text{Bec}}$ ”进一步并入 v_{Cause} ,核查后者的动词特征,如(19b)所示。

3 对于“ $\sqrt{\text{哑}} -v_{\text{Bec}}$ ”移至上层中心语“ $\sqrt{\text{唱}} -v_{\text{Cause}}$ ”的动因,请参见杨大然(2021)在 DM 框架下的解释。限于篇幅,此处不再赘述。

5. 对强弱动结式句法差异的解释

下面以(20)和(21)为例来解释强弱动结式在句法表现上的差异,这些差异与两类动结式的句法生成机制直接相关。

- (20) a. 张三唱得嗓子都哑了。 b. 那首歌唱哑了张三的嗓子。
 (21) a. ? 李四削尖了铅笔。(意向义:李四削其他物体时使铅笔变尖了)
 b. * 李四削得铅笔都尖了。
 c. * 那支铅笔削尖了李四的刀子。

首先来看在允准伪宾语上的区别。强动结式(18a)的生成过程如(19a)所示,词根“√哑[z]”生成于 v_{Bec} 的补足语位置,语义上指向处于[Spec, v_{Bec} P]的“嗓子”;词根“√唱[y]”则与 v_{Cause} 发生融合,该词根只表达致使的方式,与下层位于[Spec, v_{Bec} P]的论元“嗓子”无语义选择关系。因此,强动结式只要求R语义指向宾语,而不强制要求V与宾语存在论元选择关系,即允许“伪宾语”的存在。对于弱动结式,如(19b)所示,词根√V[y]和√R[z]在句法推导中先合并后定类,两者并入 v_{Bec} 后形成复合词项“ v_{Bec} -√削尖[y]”。那么,处于[Spec, v_{Bec} P]的内论元“铅笔”必然与组成该词项的“√削[y]”和“√尖[z]”都存在语义联系,因此该论元不能是动词“削”题元结构之外的伪宾语成分,否则句子难以接受,如(21a)所示。

其次来看能否转换为带“都”的“得”字句。Huang(2006)指出,“得”字句中的“得”作为表达结果性或致使性语义的功能语素,是轻动词 v_{Bec} 或 v_{Cause} 的语音实现,“得”前的动词V以词根形式嫁接于“得”,V的句法性质受到压制,只表达结果变化或致使的发生方式。至于具有反预期性质的“都”,其作为焦点副词,应处于句子结构的较高位置,与功能语类相关联(程工、杨大然2016)。据此本文认为,“都”是焦点投射的焦点短语(FocusP)的中心语(参见何丽萍、韩景泉2014),它以焦点成分“嗓子”为标志语,以结果投射 v_{Bec} P为补足语。例(20a)的句法结构如下所示:

- (22) [v_{CauseP} 张三 [v_{Cause} √唱-得 (v_{Cause}) [FocusP 嗓子 [Focus- 都 [v_{Bec} · v_{Bec} -√哑]]]]]
-

可以看到,(22)的生成要求词根“√唱”和“√哑”在不同位置进入句法推导,以获得句法定类。从例(19a)与(19b)的对比来看,前者所涉及的融合和并入操作可以满足这一要求,因而(18a)能够转化为带“都”的“得”字句(20a)。从本质上讲,“√唱”与“得”的嫁接跟(19a)中“√唱”与功能语素 v_{Cause} 的融合并无二致,区别在于例(19a)的√R并入 v_{Bec} 后可以继续上移并入 v_{Cause} ,而“得”字句中的 v_{Cause} 有语音实现(即“得”),“得”阻碍下层 v_{Bec} 向 v_{Cause} 移位,使得补

语成分成为独立小句。例(18b)之所以无法转换为带“都”的得字句(21b),是因为词根“√削[y]”和“√尖[z]”率先合并后在推导中始终作为一个整体,两者不能拆分,词根“√削[y]”无法单独作为附加语与“得”发生融合,而“√削尖[y]”整体与“得”合并后得到的句子不合法,也无法满足焦点副词“都”的语义要求。

最后来看在能否构成倒置动结式上的差异。彭国珍(2011)认为,倒置动结式由重动句派生而来,如例(20b)的初始结构为“(张三)唱那首歌唱哑了张三的嗓子”。蔡军、张庆文(2017)也提出倒置动结式的主语表面上是名词成分,实则是隐性事件性致事,句法上实现为以 v_{Do} 为核心的投射 $v_{Do}P$ 。例(20b)的基础结构为(23),而后根据同语删略规则(equi-deletion),致事中的“张三”和词根“√唱[y]”都被删除,形成倒置动结式。

- (23) [v_{CauseP} [$v_{Do}P$ 张三 [v_{Do} √唱[y]- v_{Do} 那首歌]] [v_{Cause} √唱[y]- v_{Cause} [v_{BeCP} 张三的嗓子 [v_{BeC} -√哑[z]]]]]

按照(23)所示的生成过程,只有强动结式才能构成倒置动结式,原因在于根据同语删略规则,句法结构中只有两个成分完全相同时才能删除其一。强动结式中词根√V[y]与 v_{Cause} 发生融合获得定类,在构成倒置动结式时,相同的词根√V[y]又与 v_{Do} 合并构成事件性致事,这两个词根均符合同语删略规则。由于与 v_{Do} 合并的词根结构位置较低,因此在音系式中被删除,只保留与 v_{Cause} 发生融合的位置较高的词根。对于弱动结式,其复合词根√V[y]R[z]是以一个整体获得句法定类并参与句法推导,在构成倒置动结式时,事件性致事主语中与 v_{Do} 合并的√V在句法结构中找不到与其完全一致的成分,无法实现同语删略,也就无法构成相应的倒置动结式,(21c)因此不合法。

6. 结语

本文以 Washio (1997)提出的结果结构二分法为背景,深入探讨了汉语强弱动结式的区分及生成机制问题。鉴于动结式V与R之间语义关系的复杂性,本文不主张采用单纯的语义判定标准,而是立足于句法-语义接口,通过设置三项鉴别式,从句法表现的差异上对两类动结式进行区分。通过考察发现,汉语强弱动结式在是否允准伪宾语、能否转换为带“都”的“得”字句和能否构成倒置动结式三方面呈现出较为一致的对立关系。这既说明汉语动结式内部确实存在强弱之分,同时也说明V与R的语义蕴含关系是与语法相关的语义要素,对动结式的句法表现产生影响。在此基础上,本文在DM框架内探讨了两类动结式的句法派生机制,将强弱动结式的不同句法表现归结为带有省略句法特征的词根在定类组合方式上的差异。强动结式是先定类后组合,√V和√R与不同

的定类语素发生融合和并入;而弱动结式的词根是先组合后定类,在推导中始终作为一个整体。两个词根在句法推导中的“分离态”和“黏合态”既反映了两者的语义蕴含关系,也直接决定了两类动结式在句法表现上的一系列差异。

参考文献

- Cai, Jun [蔡军]. 2021. On the internal structure and syntactic derivation of resultative V-V compounds in Mandarin Chinese [J]. *Modern Foreign Languages* (3): 305–317. [汉语动结复合词的内部结构与句法推导,《现代外语》3]
- Cai, Jun & Qingwen Zhang [蔡军、张庆文]. 2017. A syntactic and semantic account for the implicit event causative construction in Chinese [J]. *Modern Foreign Languages* (3): 304–313. [汉语隐性事件性致使句的句法语义研究,《现代外语》3]
- Cheng, Gong & Yangqin Chi [程工、池杨琴]. 2017. DE = BECOME + CAUSE? [J].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4): 514–524. [“得”=变得+使得?,《外语教学与研究》4]
- Cheng, Gong & Daran Yang [程工、杨大然]. 2016. The word order of Mandarin resultative verb compounds and its related problems [J]. *Studies of Chinese Language* (5): 526–540. [现代汉语动结式复合词的语序及相关问题,《中国语文》5]
- Embick, D. & R. Noyer. 2007. Distributed Morphology and the syntax-morphology interface [A]. In G. Ramchand & C. Reiss (eds.). *The Oxford Handbook of Linguistic Interfaces* [C]. Oxford: OUP. 289–324.
- Fan, Sheng-yang. 2013. Argument Structure in Mandarin Chinese: A Lexical-Syntactic Perspective [D]. Ph.D. Dissertation. Universidad Autónoma de Madrid.
- Haugen, J. 2009. Hyponymous objects and late insertion [J]. *Lingua* 119(2): 242–262.
- He, Liping & Jingquan Han [何丽萍、韩景泉]. 2014. A minimalist study on the lian...dou/ye construction [J]. *Language and Translation* (4): 11–15. [“连……都/也”结构的句法研究,《语言与翻译》4]
- Huang, C.-T. James. 2006. Resultatives and unaccusatives: A parametric view [J]. *Bulletin of the Chinese Linguistic Society of Japan* 253: 1–43.
- Huang, C.-T. James, Y.-H. Audrey Li & Yafei Li. 2009. *The Syntax of Chinese* [M]. Cambridge: CUP.
- Kaufmann, I. & D. Wunderlich. 1998. Cross-linguistic patterns of resultatives [OL]. https://www.researchgate.net/publication/245816553_Cross-linguistic_patterns_of_resultatives (accessed 03/07/2023).
- Levin, B. & M. Rappaport Hovav. 1995. *Unaccusativity: At the Syntax-Lexical Semantics Interface* [M]. Cambridge, MA.: The MIT Press.
- Levin, B. & M. Rappaport Hovav. 2005. *Argument Realization* [M]. Cambridge: CUP.
- Li, Chao. 2008. *Mandarin Resultative Verb Compounds: Where Syntax, Semantics, and Pragmatics Meet* [M]. München: LINCOM Publishers.
- Li, Chao. 2014. A three-way distinction of English resultatives and its implication for resultative typology [J]. *Concentric: Studies in Linguistics* 40(2): 1–28.
- Li, Yafei. 1999. Cross-componential causativity [J]. *Natural Language & Linguistic Theory* 17(3): 445–497.

- Mateu, J. 2012. Conflation and incorporation processes in resultative constructions [A]. In V. Demonte & L. McNally (eds.). *Telicity, Change, and State: A Cross-categorical View of Event Structure* [C]. Oxford: OUP. 252–278.
- Napoli, D. 1992. Secondary resultative predicates in Italian [J]. *Journal of Linguistics* 28(1): 53–90.
- Neeleman, A. & H. van de Koot. 2002. Bare resultatives [J]. *Journal of Comparative Germanic Linguistics* 6(1): 1–52.
- Peng, Guozhen [彭国珍]. 2011. *Resultative Small Clause and Resultative Verb Compound in Mandarin* [M]. Hangzhou: Zhejiang University Press. [《结果补语小句理论与现代汉语动结式相关问题研究》。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
- Shen, Jiaxuan [沈家煊]. 2003. The resultative construction in Chinese: A typological perspective [J]. *Chinese Teaching in the World* (3): 17–23. [现代汉语“动补结构”的类型学考察,《世界汉语教学》3]
- Simpson, J. 1983. Resultatives [A]. In L. Levin, M. Rappaport & A. Zaenen (eds.). *Papers in Lexical-Functional Grammar* [C]. Bloomington, IN.: Indiana University Linguistics Club. 143–157.
- Snyder, W. 2001. On the nature of syntactic variation: Evidence from complex predicates and complex word-formation [J]. *Language* 77(2): 324–342.
- Washio, R. 1997. Resultatives, compositionality and language variation [J]. *Journal of East Asian Linguistics* 6(1): 1–49.
- Wechsler, S. 2005. Resultatives under the “event-argument homomorphism” model of telicity [A]. In N. Erteschik-Shir & T. Rapoport (eds.). *The Syntax of Aspect: Deriving Thematic and Aspectual Interpretation* [C]. Oxford: OUP. 255–273.
- Xiong, Xueliang & Wei Wei [熊学亮, 魏薇]. 2014. A causative approach to reversal resultative constructions [J].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4): 497–507. [倒置动结式的致使性透视,《外语教学与研究》4]
- Xiong, Zhongru [熊仲儒]. 2004. *Causative Constructions in Mandarin Chinese* [M]. Hefei: Anhui University Press. [《现代汉语中的致使句式》。合肥:安徽大学出版社]
- Yang, Daran [杨大然]. 2021. A comparative study on English and Mandarin causative construction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Distributed Morphology [J].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2): 163–176. [英汉致使结构的对比分析:基于分布式形态学视角,《外语教学与研究》2]
- Yang, Yanhua [杨炎华]. 2021. How syntax works in word formation [J]. *Contemporary Linguistics* (2): 159–180. [句法何以构词,《当代语言学》2]
- Zhang, Niina Ning. 2007. A syntactic account of the Direct Object Restriction in Chinese [J]. *Language Research* 43(1): 53–75.
- Zhang, Xiaowen. 2019. Strong and weak resultatives in Chinese resultative constructions [J]. *Theory and Practice in Language Studies* 9(12): 1524–1534.
- Zhou, Guanglei [周光磊]. 2019. On generating the Mandarin VV compounds: A Distributed Morphology perspective [J]. *Foreign Languages Research* (4): 30–37. [从分布式形态学看汉语 VV 型复合词的生成机制,《外语研究》4]

收稿日期: 2023-09-18;修改稿 2024-03-15;本刊修订 2024-05-12

通讯地址: 311121 浙江省杭州市 杭州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

Abstracts of papers in this issue

Recursive modes of appositive clause structures in English (p. 483)

DING Yuzao (College of Foreign Languages, Fujian Business University, Fuzhou 350016, China)

WAN Zhenghui (School of Humanities, Fuji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Fuzhou 350118, China)

WANG Liping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Nanchang University, Nanchang 330031, China)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ways in which complex appositive clause structures in English are constructed and the differences and commonalities between these ways. Through counting and analyzing the appositive clauses in an academic English book *Grammaticalization* (Hopper & Traugott 2001), we find that complex appositive clause structures are generated by two recursive modes — marginal component recursion and core component recursion, whose rewriting rules are different. The multiple applications of marginal component recursion, namely multiple recursions, can generate multiply recursive structures. Core component recursions are more generative than multiple recursions. However, they show some commonalities; that is, they both have the property of rightward iteration, thus making recursive computation easier.

An expansion of studies on phraseological items through the approach of local grammars: A case study of the *X is that/to* in *U.S. State of the Union Address* (p. 496)

LIU Yunfeng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Anhui Polytechnic University, Wuhu 241000, China)

Phraseological items have been the focus of corpus phraseology and discourse analysis since they were first proposed, but the description of phraseological items rarely involves local grammars, which fails to explore the local restraints of co-selection between lexis and grammar. Taking *the X is that* and *the X is to* in subject texts as examples, this paper makes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local grammar patterns of the phraseological items and summarizes the co-selected features of lexis and grammar as well as the local textual functions. The following are the results. 1) Phraseological frame has a dominant role of grammatical restriction, but the filled words are flexible in form and variable in meaning, and the frame demonstrates lexical, syntactic, and semantic productivity while implementing grammatical restriction. 2) The filled words tend to form a limited number of semantic sets, and the selection of these words via the frame presents a hierarchical priority in both form and semantics; the components on both sides of the frame exert an unbalanced collocation pull on the filled words. 3) All constituents of the phraseological items have their own variants, and the local grammar patterns of the items reflect the dynamic trends of meaning shift and perform distinctive local textual functions in the co-selection of lexis, grammar, semantics, and pragmatics. The results of this study expand the contents of phraseological items through the approach of local grammars and deepen the exploration of text meaning, which is significant for promoting the development of text thematization in corpus phraseology and discourse analysis.

A comparative study of strong and weak resultative verb compounds in Mandarin under Distributed Morphology (p. 507)

YANG Daran & SHI Yanling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Hangzhou Normal University, Hangzhou 311121, China)

Based on Washio's (1997) classification of strong and weak resultatives, this study examines the distinction between strong and weak resultative verb compounds (RVCs) in Mandarin and their generations. Three diagnostic tests are established to distinguish the two types of RVCs in light of their syntactic behaviors, testifying to the dichotomy in Mandarin from a syntactic-semantic perspective. The generation of strong and weak RVCs is analyzed under the framework of Distributed Morphology, and their distinctive syntactic properties are attributed to the difference in how roots with deficient features are categorized in syntax. In strong RVCs, the two verb

roots acquire their categorial features with different functional heads before they merge into a compound. In weak RVCs, however, the two roots merge first to form a compound root, which is then categorized by the upper head. The “separating status” and the “bonding status” of the two roots in derivations not only reflect their semantic implication relations, but also determine the distinction in syntactic behaviors between strong and weak RVCs.

The theoretical model of multimodal dictionaries and their definitions within the framework of media convergence (p. 519)

ZHANG Yihua (Center for Linguistics and Applied Linguistics/Center for Lexicographical Studies, Guangdong University of Foreign Studies, Guangzhou 510420, China)

Digitalization and media convergence have had a profound impact on foreign language learning and dictionary use, altering language teaching methods, representational elements and content, and the organization of lexicographical definitions. This study aims to serve the interests of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 and the pedagogy of multiliteracies. First, it outlines the problems of media-converged dictionaries and clarifies three relationships in the convergence mechanism of these dictionari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edia convergence and lexicography,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ultimodality and multimedia, 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edia convergence and multimodality. In this context, five layers of multimodal convergence are addressed: the physical-perceptual, cognitive-sensory, mental-cognitive, logical-media, and physical-media layers. It then discusses the design concept of multimodal texts based on the theory of multimodal definitions, including user needs, design methodology, and the constitutive structure of multimodal texts. Finally, it focuses on the elaboration of the theoretical model of multimodal dictionary definition, including the functions of multimodal texts, the setting of multimodal elements, the patterns of multimodal definition, and the compilation of multimodal definition texts based on large language models and multimodal discourse analysis.

Internal differences among language families in global languages (p. 532)

RAN Qibin (School of Literature, Nankai University, Tianjin 300071, China)

WANG Yiting (School of Literature, Northeast Normal University, Changchun 130024, China)

Using language doculects collected from the Automated Similarity Judgment Program (ASJP) database as research materials and adopting the automatic similarity judgment method of language, we calculated the internal language distances and similarities of 20 major language families in the world to examine language differences within language families. The results show that Nuclear New Guinea languages have the greatest difference among the 20 language families and that Mayan languages have the smallest difference. The distribution of the data shows that language families with large internal differences have a concentrated distribution of language similarity data, with most languages distributed near the mean, showing a symmetrical “olive-shaped” distribution; language families with moderate internal differences have a relatively concentrated distribution of language similarity data but with some languages or dialects with high similarity, showing an asymmetric “olive-shaped” distribution; language families with smaller internal differences have language similarity data showing “dispersed” bipolar or multipolar distribution. Our analysis of the internal differences among controversial families suggests that language groups with high similarity exert a stronger influence on intrafamilial patterns. Additionally, similarity analysis proposes the possibility of gauging the extent to which certain language groups diverge from other languages in the language family.

A behavioral profile study of vision verbs from a cross-linguistic perspective (p. 544)

DAI Ying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Fuzhou University, Fuzhou 350108, China)

WU Yicheng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Zhejiang University, Hangzhou 310058, China)

Cross-linguistically, there are two basic types of vision verbs, viz., “visual activity verbs” (the action-oriented LOOK type) and “visual experience verbs” (the result-oriented SEE type). However, there is controversy over whether such a distinction exists among Mandarin vision verbs. Some scholars believe that the two basic vision verbs *kan* and *jian* have distinct meanings, whereas others claim that they are almost the same in meaning. To resolve this divergence, this